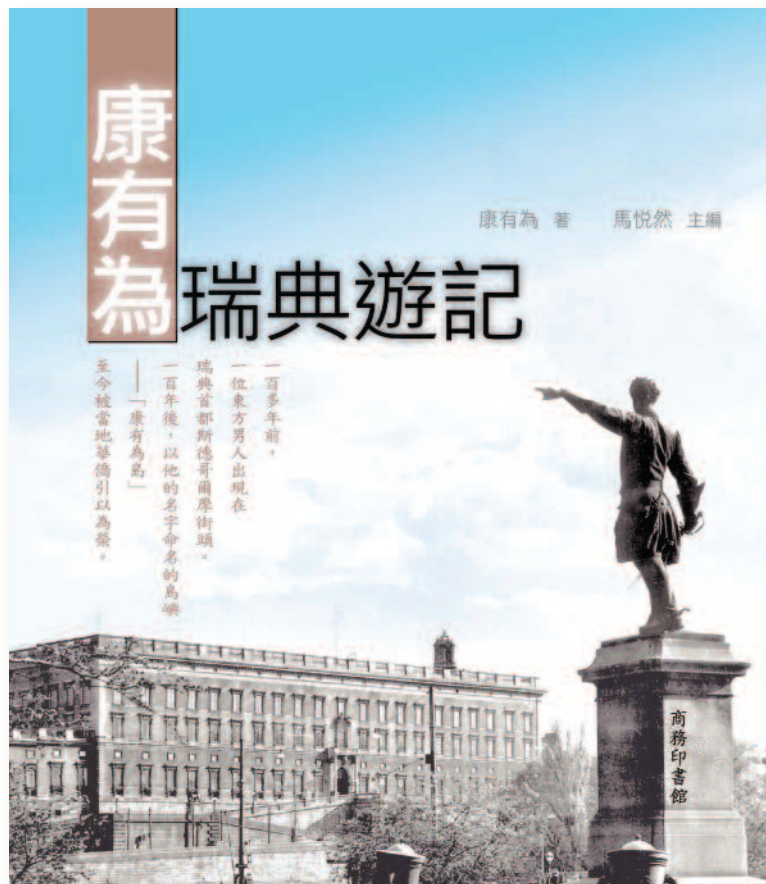


略談康有為先生的思想基礎， 政治活動和考證學謬論



馬悅然主編，《康有為瑞典遊記》書影（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馬悅然

瑞典學院院士

古今論衡 第 30 期 2017.10

清光緒三十年七月九日，等於陽曆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九日，一名穿著長袍的東方男人和一名穿著旗袍的東方姑娘到達了斯德哥爾摩的長途公共汽車站。車站的瑞典人肯定睜著眼睛偷偷地看他們：那位穿裙子的先生和那位斜眼睛的姑娘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一個正好在場的新聞記者壯著膽子接近那兩位陌生的旅客。過了兩天瑞典最大的日報刊登了短短的一則新聞報導：「一位自稱康有為的中國老先生 19 日從挪威來到斯德哥爾摩。」那時康有為才四十六歲！他二十一歲的女兒同璧一九〇三年到美國去讀哈佛大學，暑假的時候到歐洲來跟他的父親團聚。過了一些時候，她在牛津大學學英文的未婚夫羅昌也到瑞典來過夏天。



圖一：斯德哥爾摩城市的河流景象，彼岸大的建築是 Grand Hotel，以及國立美術館。
(影像資料作者提供)

一九〇四年夏天，《瑞典日報》每天登滿了關於俄日戰爭的報導。日報的社論也常提到威脅西方國家可怕的「黃禍」。要是那記者知道康有為是誰，他肯定會跟隨他到 Grand Hotel（當時瑞典首都最大且最貴的飯店），要求採訪那來自遠方的要人。說不定會因此得到總編輯的稱讚，那麼他的薪水也會提高一點。

一到瑞典，康有為開始寫作他的《瑞典遊記》。這部日記沒有收錄在發表於一百年前的《歐洲十一國遊記》中的原因，也許是因為沒有找到會校對書稿的瑞典人。一九五六年，我在瑞典駐華使館當文化秘書的時候，康同璧女史通過他的秘書託我校對她父親《瑞典遊記》的稿子。康同璧從一九五六年擔任政協委員。他的秘書張滄江是康有為的弟子張伯楨（1877-1946）的孫子，北京史專家張次溪（1909-1968）的兒子。張滄江那時是中國醫學院的總秘書，他寫了一手好書法。《瑞典遊記》的稿子，正楷字雖然寫得很好，但是其中的錯字讓我懷疑不是出自張滄江的手。一九七〇年，



圖二：斯德哥爾摩的政治中心：寬敞宏偉的王宮以及國會。（影像資料作者提供）

我才為康有為的《瑞典遊記》加了註解，譯成瑞典文。二〇〇七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始出版這部書的原文。

康有為是一位非常好奇的人，他的注意力也很強。他在瑞典滯留的頭一個月內參觀了托兒所、小學、中學與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國會、國立銀行、造幣廠、歌劇院、音樂院、監牢、醫院、養老院、救濟院、各種工廠、公共浴室、理髮店、首都裡的皇宮與郊外的行宮、平民的公寓等等。

康有為和周國賢九月五日在皇家圖書館的旅客登記簿簽了名。周國賢是康有為的秘書。因為日記中沒有提到周國賢，沒法知道他是否跟康有為一路到瑞典來的。

八月二十一日康有為在斯德哥爾摩群島上的一個小村得知他的恩人翁同龢七月三日去世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大盤陀石上望北海哭之。海風怒號，海浪洶湧，青天慘慘，若助吾哀。一老不遺，為中國痛，非徒感推轂之私也。」

* * *

讓我現在回顧一下康有為先生早期的活動。他是廣東南海人，生於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是研究宋代理學的名家。除了宋理學與佛學外，他泛讀有關新知識的外文譯著。從一八八〇年代起，他越來越覺得「西人治國有方」，不應該將外域的人都看作是不進化的夷狄。

一八八八年以來，民族危機越來越深的時候，康有為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在他的〈上清帝第一書〉中他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中日甲午戰爭後，保守派和革新改良派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一八九五年春，康有為上北京參加進士考試的時候，總理大臣李鴻章與日本訂定和約，割遼東半島與臺灣等各島嶼並賠銀二萬萬兩。各省上北京去考進士的舉人群情激憤。康有為以一晝兩夜的功夫寫成〈上清帝第二書〉：「伏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一共有 1,200 多人參與聯名上書。

上書之後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第八名，進入工部當主事。到任之前，他在兩個月之間上了兩書，對他所提出的變法內容作了具體的補充。他上書之舉被朝廷中的頑固派所阻擋，以致未得上達。

一八九七年德國軍隊強佔山東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康有為上書稱：「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捨變法外，別無他圖。」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最根本的目的是把中國變成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李鴻章邀請康有為到總理衙門，給朝廷的一些大臣介紹變法的意義。在場的有支持變法運動的——當了二十年德宗（光緒）皇帝的導師翁同龢，也有反對變法的頑固派中的重要人物——榮祿。第二天，康有為又進呈《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這兩書引起光緒皇帝對變法的興趣。在不到三個月之內，從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光緒皇帝發布出一系列關於改善教育系統的詔書。在這「百日維新運動」期間，康有為有機會會見光緒皇帝。除了康有為，參加變法運動最重要的人物是梁啟超和譚嗣同。

慈禧太后眼見康有為對光緒皇帝的影響越來越深，當然懂得這越來越威脅她自己的權力。因此她決定採取措施停止變法運動。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光緒皇帝怕自身難保，因此偷偷地寫信給康有為，要求他想辦法救自己。康有為深知學者的筆墨抵不上武士的兵器，因此勸皇帝接見袁世凱。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皇帝把袁世凱找來，跟他密談國家大事。九月十七日，康有為派譚嗣同半夜去找袁世凱，意在勸袁世凱推翻以慈禧太后的寵臣榮祿為首的頑固黨派。袁世凱以此事密告榮祿，榮祿立刻報告給慈禧太后。九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把光緒皇帝拘禁在瀛臺。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被處死。康有為經天津逃到香港。「百日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康有為流亡國外。

* * *

康有為參觀的一所育嬰院令他驚訝：「院皆紅牆黃板，妙麗甚矣。院外敞地，雜植花木，院三層遊廊亦多置花，以悅嬰兒也。院長醫生也，一正二副。每嬰兒一小鐵

床，白毯。軟褥，小枕，每一保姆育一嬰或二三嬰不等。凡保姆皆由自己發願，不給工資。／……／聞野生子為多。／……／膳室及廚廣大而精潔。見此如見大同世也。」

一八八四年，康有為二十六歲的時候，寫下了頗具烏托邦性的《大同書》的初稿，直到一九〇二年才定稿。作者生前沒有發表過這部書，好像也不願意發表。一九三五年，作者去世八年之後，《大同書》才面世。全書所體現的烏托邦思想比作者的革新綱領激進得多。

《大同書》為未來的社會設計一種理想的全球性的烏托邦。在康有為看來，人類社會中所有的惡果都源自於人內心的自私。在《大同書》裡作者拆毀人類為保護家庭與私有財產所建築的保障。作者認為婚姻制度是滋生而鞏固社會不公正和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主張用一種同居合約來代替婚姻。合約有效時間為一年。如雙方同意，合約可以延長。

大同社會沒有國界，地球分成許多編號的正方形的區域。公民可以自由而有秩序地由一個地區搬到另一個地區。這樣，由氣候決定的種族的特點會慢慢地消失。由於黑色人的存在，世界公民的皮膚不能完全是白的，因此康有為主張超越種族界限的同居合約。

國立的托兒所、小學、中學和大學保證所有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因為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國有化，國家也能有效地按照社會需要調整教育的內容。

在大同社會，隨著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們的工作時間會大幅縮短。因此，國家必須保證人民可以享受豐富的業餘生活。大同社會的公民可以藉由發達的陸、海、空電力交通工具到任何他們願意去的地方。在風景美麗的地方有設備完美的養老院。

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的人可能會發現《大同書》與《共產黨宣言》有不少共同之處。康有為不懂外文。《共產黨宣言》的全文在一九二〇年才譯成中文，所以康有為寫《大同書》的時候肯定沒有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譯文。但康有為跟馬克思、恩格斯一樣主張取消私有制、婚姻制度和所有的界限，提倡女性解放和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三位學者有同樣的理想，但各自的思想參照點、動機和策略完全不同。《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參照的是歐洲的工業革命，而康有為因為受儒家的影響，從宇宙的角度來審查社會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共有之後，階級鬥爭自然會消失。康有為則認為大同社會是和平演進的結果。（於一八九七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裡，康有為試圖證明這種和平的社會發展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的教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為共產主義社會設立任何道德或者倫理原則，他們認為個人所屬的階級決定他們的宗教、哲學、道德和其他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則建立在孟子「不忍之心向善，如水之就下也」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類的痛苦都是經濟剝削所引起的。年輕時學過佛學的康有為深入分析人類痛苦的根源。

* * *

一九七六年，美國學者馬丁·貝納爾（Martin Bernal）在他的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中譯本：丘權政、符致興譯為《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① 中曾把康有為的《大同書》與另一部發表於一八八八年的著作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回顧：2000-1887》）作了比較。《回顧：2000-1887》的作者是艾得瓦·貝拉彌（Edward Bellam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輕的美國人，他從一八八七年夏天某個夜晚一直睡到二〇〇〇年才醒過來。醒來之後卻發現身處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原來在他一百多年的沉睡中，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變革的動力不是經過階級鬥爭或者革命，而是世界各國人民終於意識到為少數公民服務的各種私有制的不合理，只有依靠一個完全國有化的經濟系統，才能建立為全世界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

各國經過同樣的演進，建立了全球化的和平新世界，再也沒有戰爭和國際爭端。

馬丁·貝納爾對兩本書作了詳細比較之後，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書》是受了《回顧：2000-1887》的影響。我不能同意貝納爾的看法。當然，所有的烏托邦思想都具有相同的特徵。兩部書共同的主張——取消私有制、取消婚姻制度、女性解放等等，都屬於所有的烏托邦思想。

無名氏翻譯的《回顧：2000-1887》的中文版連載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二年四月的《萬國公報》上，^② 為外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和傅蘭雅（Timothy Richard）主辦的刊物。從一八九五年起，《萬國公報》對維新運動有一定的影響。《回顧：2000-1887》中譯本第一章用「大同」這個詞來命名新社會。貝納爾因此判斷康有為的大同觀念是從貝拉彌的書借來的。這種牽強的猜測肯定是錯誤的。「大同」一詞最早出現在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篇受早期道家影響的文本肯定描寫一種遠古時代的理想社會。可是讀者也可以將這篇文本當作對未來社會的一種烏托邦的描寫。

① 丘權政、符致興翻譯，《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② 《萬國公報》連載時譯為《回頭看紀略》，譯者署名「析津」。

* * *

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建立了保皇會。該會的目的是支持光緒皇帝，敵對朝廷上的頑固分子。一九〇四到一九〇六年，斯德哥爾摩作為保皇會的司令部。康有為在國外相當奢華，生活費用都靠華僑捐給保皇會的錢。一九〇六年康有為取消保皇會，讓新建立的帝國憲政會來代替保皇會的作用。這種整頓一點也沒有影響康有為的生活方式。

康有為一九〇六年秋天在離瑞典首都二十公里的海島上買了一棟相當大的別墅。把別墅賣給康有為的一位姓瓦倫（Wahlund）的船長對記者說：康有為問都沒有問那別墅的價錢，馬上付現把它買下來。那時康有為在瑞典的家人比較多：除了康有為自己還有他的女兒同璧和她的未婚夫、同璧的姐姐同薇和她的丈夫麥仲華及一個出生在瑞典已經學會講瑞語的三歲女兒、康有為新娶的出生在美國的十六歲姑娘——何旃理，會四種語言的何旃理當康有為的翻譯和秘書。還有兩個男傭人，一個叫 Mo Ying 的中國人、一個叫 Rupert Humer 的奧地利人以及康有為的秘書 C.S. Linn。按照地方報紙的漫談專欄，住在那別墅的陌生人好像對女性特別感興趣。主人的妻子不在家的時候，她年紀大的丈夫常常請年輕的女人到他家裡玩。

康有為把他居住的海島命名為「避島」，把別墅命名為「北海廬」。他住在北海廬的時候寫他的《避島詩集》，發表在《康南海先生詩集》。^③

按照康同璧所述，康有為在光緒三十三年五月（June/July 1907）把北海廬賣給瓦倫船長。去訪問歐洲幾個國家之後，康有為於一九〇八年春天回到瑞典去，跟女兒同璧再一次訪問挪威。一九〇八年七月，康有為離開瑞典，把馬來西亞的濱城選為他新的司令部。一九一三年康有為回到中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他一直反對共和制，一直宣揚復辟。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秘密上北京，希望跟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讓溥儀登基。北洋政府的總理段祺瑞很快逼著康有為和張勳的復辟宣告失敗。

* * *

康有為的品格是非常複雜的。我在這裡介紹的是一名考取進士的名儒、對佛教有研究的學者、一位全心願意為國家服務的敢說敢做的政治家、一位同情人類的烏托邦

③ 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思想家。可是，他同時也是一位自私的、為自己服務的、靠華僑捐款給保皇會與帝國憲政會的錢，讓他自己連同家人和友人們在國外過著一種非常奢華的生活。在《大同書》裡主張男女平等的康有為有六個妻子；四十八歲的時候，他娶了他的第三個妻子——十六歲的何旃理；六十一歲的時候，他娶了他的第六個妻子，十九歲的張光。

我現在要講的是康有為先生在考證學方面的謬論。漢代發生了所謂今文經與古文經之間相當激烈的論戰。古文經是漢代初所發現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寫下來的經。今文經指的是漢代當時生徒用通行的隸書記下他們老師口傳的文本。今文經發生於西漢初年，《五經》都立博士，強調微言大義。發生於西漢中葉的古文經則強調訓詁。

兩派學說，大起爭議。在西漢時代今文派占了上風，可是在東漢時期古文派則處於主導地位。漢朝以後，今文與古文派之間的爭議慢慢地平息了。到了十八世紀兩派之間重燃戰火。莊存與（1719-1788）和他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研讀《公羊傳》與《春秋繁露》。劉逢祿認為這兩部書容納孔子政治思想的總結。他試圖靠這兩部書來充分解釋孔子表達褒貶的微言。劉逢祿認為《左傳》原來不是訓釋《春秋》，在這一點他一定是正確的。他還斷言劉歆（公元前 50 到公元 23 年）把《左傳》修纂成爲《春秋傳》，以便加強古文派的地位。

劉歆屬於漢朝一個皇親國戚之家——他的高祖是漢朝開國皇帝的弟弟。劉歆的父親劉向（公元前 79-8 年）是一位傑出的學者，立爲《穀梁傳》的博士。公元前二十六年，皇帝命令劉向整理宮廷所藏的書籍。劉向爲每一部著作編了解題的別錄，然後跟書籍一併交給皇帝。劉歆補充他父親的圖書目錄，編成自己的目錄《七略》。他的目錄後來成爲《漢書藝文志》的基礎。

劉歆原來跟王莽（公元前 45 到公元 23 年）同爲朝廷輔臣。外戚王莽逐漸篡奪了政權，公元九年登基爲新朝皇帝。中國傳統的史書把這僅存十四年的朝代看作是一個過渡期。王莽掌政權後尊劉歆爲國師。博學的劉歆對解釋《春秋》和《左傳》中所記錄的不吉的預兆以及從全國各地收集的各種預兆感興趣。劉歆所解釋的預兆被利用於當時的政治辯論，因而引人指責他篡改或者乾脆自己僞造了《左傳》。

劉逢祿關於劉歆跟《左傳》的斷言發表在他的《左氏春秋考證》第一卷。康有為把劉逢祿的看法發展達到荒謬的地步。他把孔子奉爲一位政治改革家，他從公羊派把孔子視爲素王（即無冕之王）的觀點中找到了理論根據。按照康有為的觀點，只有孔子所創作的今文經派的典籍才是真的。爲了貶低古文派和他們的經典，康有為於一八九一年發表了《新學僞經考》。他在這部著作中譴責劉歆爲了使王莽的篡奪權力合法化而僞造《左傳》。在一八九七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康有為斷言孔子爲了「托古改制」而僞造了六經。

我的老師高本漢在一九二六年發表的論文〈左傳真偽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刊於《哥特堡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3 號，1926 年。〕中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左傳》成書的歷史以及對該書的真偽不同的意見；第二部分調查《左傳》的語法結構，而且討論其與其他幾部經典著作語法結構的關係。高本漢指出他的老師，法國有名的漢學家沙畹（法語：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翻譯司馬遷的《史記》時，發現司馬遷在引用古籍時，常常使用常見易懂的詞語代替罕見難懂的詞語。經過大量的調查以後，高本漢舉出《史記》中多處引用《左傳》的例子。在這篇論文，高本漢主要抨擊劉逢祿的學說。

在一九二九年發表的論文〈中國古籍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高本漢討論了幾部在中國訓詁學與考證學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如南宋晁公武（1105-1180）的《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1183-1262）的《直齋書錄解題》，清朝姚際恆（1647-1715）的《古今偽書考》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家。高本漢很深入地討論中國歷代考證學者所利用的辨別真偽的標準。

高本漢在一九三一年發表的〈《周禮》和《左傳》的早期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刊於《遠東博物館館刊》第 3 期，1931 年，頁 1-59。〕嚴厲的批評康有為完全缺乏科學證據的學說。他指出從《左傳》和《周禮》引用的詞語不僅出現在《史記》，也出現在來自公元前二〇〇年的典籍中，甚至還有公元前三〇〇年的例子。

在這篇論文的結尾高本漢寫道：

學者的名譽是一件嚴肅的事。按照我的觀點，學者是一位當代傑出的西方語言教授，還是一位生活在 2000 年前的中國學者，都沒有關係。兩位都需要公正對待。當我們譴責一位當代的作者偽造一部作品時，我們必須特別謹慎。我們必須拿出強有力的論點來證明我們的譴責。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們在要求證據的時候，對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名偉大的英雄，一個我們該感謝的人，一位多虧他的天才，學問，活力和激情，我們才了解中國經典圖書目錄的學者，爲什麼不要求同樣嚴格的證據。我最大的希望是對這位爲自己國家辛勤服務的偉大學者，要施之公正。

高本漢的這三篇論文發表於一九二六、一九二九與一九三一年。一九三〇年，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發表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④ 在這篇論文，錢穆先生完全令人信服地證明劉歆不可能偽造了《左傳》與其他的古文經。錢穆用的方法不同於傳統考證學家所用的，全靠《前漢書》所提供的資料，錢穆提出 28 個要是康有為還在世的

^④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7（1930）。

話肯定難於回答的很實際的問題。錢穆提出的頭幾個問題就足以推翻康有為的學說：劉向死於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 8 年）。不到兩年之後，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 6 年），劉歆爭為《左傳》立博士。要是劉歆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前偽造了《六經》，他作為今文《穀梁傳》博士的父親怎麼會不知道此事呢？要是劉歆在他父親去世之後才偽造《六經》，就只有不到兩年的功夫完成那巨大的計畫。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大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穆從另外的角度來反駁康有為的學說。

按照我的看法，一個想偷偷地偽造《六經》的西漢人面對的問題真不少。《六經》包括 391,478 個字。每一副竹簡平均容納 24 個字。因此，偽造者需要 16,311 片竹簡和幾里長的麻繩。「殺青」的技術肯定相當費時。用繩子把竹簡串連起來成書可能也很費時。最費時的當然是偽造《六經》的文本。

五年之內，高本漢和錢穆各自獨立地用完全不同的考證學的方法徹底地駁倒了康有為由政治動機提出的學說。高本漢和錢穆肯定沒有見過面。他們兩位學者在兩個遙遙相隔的國度出生、治學。兩位學者生於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年頭，高本漢於戊戌政變發生的一八八九年，錢穆於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的一八九五年。高本漢有幸在和平的環境中從事他的研究，而錢穆的學術研究是在遭戰爭與內亂的國家裡完成的。兩個學者有一點確實共同的，就是他們兩位堅信學術研究超然於政治之上。

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表達我對錢穆先生的尊敬。一九五〇年，我在四川做了兩年的方言調查之後，在香港跟錢穆先生見面。當年三月建立的新亞書院那時剛剛搬進了九龍，深水埗，桂林街。錢穆先生很溫柔地接待自遠方來的一個年輕的學者。我記得我們那時討論的就是我的老師高本漢的研究。